

陕西历史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THE
SHAANXI
HISTORY

JOURN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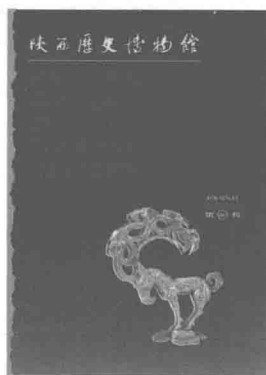
2009
馆 16 刊



陕西历史博物馆

NATIONAL MUSEUM OF THE SHAANXI HISTORY

2009



JOURNAL
館 (16) 刊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16辑/成建正主编.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7-80736-717-8

I. 陕… II. 成… III. ① 历史博物馆-陕西省-丛刊
② 考古-中国-丛刊 ③ 文物保护-中国-丛刊 IV.
G268.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8241 号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第16辑)

	陕西历史博物馆 编
	成建正 主编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电 话	(029)87205106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陕西中实艺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
插 页	13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36-717-8
定 价	50.00 元

网 址 WWW.sqcbbs.com

陕西历史博物馆前景





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

编辑委员会

顾问 张岂之 石兴邦

周伟洲 斯维至

何清谷 牛致功

主任 成建正

副主任 马振智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振智 文 军 毛 健

申秦雁 田小娟 成建正

师小群 张维慎 李 鸣

杨 瑾 程 旭 梁彦民

韩建武 董 理 蔡昌林

馆刊编辑部

主 编 成建正

副主编 王 彬 张维慎

编 辑 梁 勉 杨效俊 田小娟

总编审 王世平

翻 译 杨 瑾

美 编 王小信

2009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来我馆参观。



2008年8月1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来我馆参观。



2009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来我馆参观。



● 2008年6月21日，『李善单油画作品大陆巡回展』在我馆东展馆举办。



● 2008年5月29日，陕西省副省长景俊海来我馆视察工作。



● 2008年9月19日，『陕西省直属机关职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摄影作品展』在我馆东展馆举办。



目 录

· 考古研究 ·

少陵原西周墓地性质蠡测	张天恩 (1)
珮生器“附庸土田”再探讨	王进锋 (6)
洛阳周山“周三王陵”墓主小考	李国强 (15)
宁夏固原地区出土春秋战国时期“触角式”青铜短剑初探	马 强 乔国平 (17)
北方地区出土鸡首壶小议	杨学晨 (27)
凌烟阁功臣图的考证与复原	蔡昌林 (34)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研究综述	韩建武 (40)
浅谈我国聚落考古的发展	李 娟 何林珊 (46)

· 史学论坛 ·

论西魏北周创建的府兵制	赵文润 (52)
秦文化中的刚与柔	汪红梅 (60)
试论唐代比部职能的转变及其原因	李志刚 董 理 (67)
“吴湘之狱”再探讨	李文才 (74)
唐代的西川节度使与地方社会 ——对李德裕出镇成都的历史考察	陈 玮 (84)
试论武则天的情感世界	田卫丽 (91)
成吉思汗在六盘山区的活动及影响	马建军 (96)
近三十年明清山东运河城市研究综述	潘宏庆 毛 曦 (103)

· 历史地理研究 ·

唐宋时期对西部矿藏的发现与认识	马 强 (109)
宋代福建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	刘锡涛 牛江红 (118)
试论邳城被多个割据政权选为都城的原因	张维慎 霍彦儒 (123)
古代韩城城市安全问题初探	吴朋飞 (128)
从《禹贡》九州看夏代域限	岳红琴 (135)

· 民族、宗教史 ·

简论谭处端与全真道	张应超 (142)
-----------------	-----------

从文献载述看唐宋时期玉华寺的历史	作录林 (149)
------------------------	-----------

· 碑石墓志研究 ·

宋刻智永《真草千字文》碑	路 远 (155)
唐张浣、李京尤夫妇墓志考释	段 毅 (163)

· 随笔札记 ·

我的为学之路	王 辉 (168)
关中方言区中东部地区一个千百年来的母题《咪咪猫》 ——从歌谣和方言等多角度考察《咪咪猫》的变体	孙立新 (171)
陇东佛道文化学术考察纪要	程 旭 文 军 杨效俊 (177)
东汉陕甘摩崖石刻与儒家统治思想三题	杨东晨 杨亚娣 (182)
法字试释 ——上古神话传说时代的法律起源说	陈文敏 (189)
浅析麟德殿的文化及其展示	钱仲芳 (192)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关时间的词语简释	徐 滢 (197)
近年来有关北宋史学家范祖禹的研究综述	高叶青 (203)

· 文物丛谈 ·

从古代陶器看中西文化的早期差异	金岷彬 (209)
从陕北“狩猎”题材汉画像石看秦汉时期陕北的地理风貌	程艳妮 (217)
谈汉阳陵南区从葬坑出土的铜量器	石 宁 (221)
汉代青铜器简说	高 伟 (225)
试论唐代金玉结合的器物	董 洁 (229)
宋珍珠地划花陶瓷器表面装饰工艺新探	王 莉 (235)
持荷玉童子产生的文化背景	王蔚华 (240)
当代仿古瓷剖析	闫存良 (243)
富平三塔	王保东 (247)

· 馆藏精品 ·

“饮水思源”话藏品

——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私人捐赠文物	王 莉 杨维娟 (250)
馆藏古灯选介	杨亚娣 王西梅 (255)
馆藏青铜造像选介	张晓艳 (259)

· 学术博览 ·

唐代艺术中戴鸟羽冠的高句丽人形象	[韩] 金莱娜 著 杨 瑾 译 (262)
------------------------	-----------------------

20 世纪国外伊斯兰古代艺术研究综览	马晋川 (275)
--------------------------	-----------

· 壁画与艺术史 ·

从画论《林泉高致集》看李郭山水的变迁	杨效俊 (282)
北周史君墓“四臂守护神”图像的相关研究	
——兼谈与“天王俑”的关系	赵 晶 (292)
陕北神木大保当汉画像石文化内涵与艺术特色浅析	邱 楠 梁昭华 王轶峰 (299)
陕北汉代画像石中所见舞蹈图试析	郑红莉 (305)
论明代院画机构的组织形式及其管理制度	杨 兵 (310)

· 博物馆学 ·

简议和谐博物馆的构建及途径	刘 洪 (315)
公共文化服务	
——博物馆职能的现代转向	周俊玲 张红玲 (319)
浅谈博物馆藏品的登记建帐与分类编目	杨维娟 (324)

· 博物馆工作 ·

开创与收获	
——记陕西历史博物馆与日本唐墓壁画合作保护研究	申秦雁 燕芳雨 (329)
新时期博物馆宣教工作的探索	贺 华 冯 莹 (334)
浅述博物馆多样化的教育活动	高 嵘 (339)
博物馆项目管理审计工作的尝试与思考	刘俊林 张 明 (343)

Main Contents	(345)
本刊征稿	(347)

· 考古研究 ·

少陵原西周墓地性质蠡测

张天恩

古墓葬不仅是研究古代墓葬制度的直接资料,而且往往因为有随葬品的出土,会比较集中地反映出其所处时代的社会习俗、文化特征、经济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等,而成为考古学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之一。包含众多墓葬的墓地则会提供更为丰富、全面的研究内容。因此,比较完整地揭露和发掘一些古代墓地,自然成为考古研究人员为之努力的目标。

多年以来,国内经考古发掘的西周墓地已为数不少,但较全面揭露的实际并不多见。如长安张家坡墓地发掘了西周墓 380 座,数量可谓众多,但与据称可能有数以千计的墓地来说,也就是很少的一部分。近年发掘的长安少陵原墓地约有西周墓 470 余座,除了一些被破坏者之外,清理墓葬达 429 座,发掘量超过 90%,可以让我们较清楚地了解墓地的全貌,并对墓地反映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承主持发掘工作的刘呆运先生厚意,笔者有幸对墓地多次参观,把摸出土遗物,并先睹了发掘报告的初稿,从而注意到随葬兵器墓葬较多是这一墓地的突出特点,遂产生了探讨墓地性质的想法,并得出埋葬者有可能属于军旅身份的认识,被报告的结语所采用。为使学界了解观点产生的过程,这里展开一些申论,以博同行评说。

少陵原西周墓地位于西安市南的长安区杜曲镇东杨万村北台塬上,西北距长安区约 5 公里,在西周都城丰镐遗址东南约 25 公里处。墓地南为一片范围较大的西周遗址,两者应是相互联系的。2004 年,西安一柞水高速公路建设工程考古项目发现了此处墓地,经对周围较大范围的认真勘探,确认西周时期墓葬为 470 余座。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决定对墓地进行全面的科学发掘,于当年 10 月到 2005 年 10 月,对保存状况较好的 429 座进行了清理。这不仅成为丰镐遗址周边地区,甚至也是陕西乃至全国发掘墓葬数量最多的西周墓地之一。该工作发现了许多重要迹象,出土了一大批重要文物^①,对于西周历史与考古学研究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少陵原西周墓地分布范围较大,南北长 200 米,东西宽 150 米。延续时间较长,以西周早中期墓为多,也有少量西周晚期墓。各个区域的墓葬方向大部分一致,少部分不同,说明其为联系紧密的同一个较大墓地。全部墓葬基本都是小型墓,随葬品以鬲、罐等陶器为主,可见绝大多数埋葬者的身份低下。极少数略大一些的墓葬,除了遭盗掘情况不明者外,保存完整者仅随葬青铜鼎一件,可能属于社会地位不高的士一级阶层。整个发掘和扩大范围的钻探始终未发现更高等级的贵族墓葬,可以认为这里为一处平民墓地。

从整个墓地布局分析,可以将之分为五个区。各区内幕葬分布较稠密,排列有序,只有极个别的墓葬存在打破关系,与其他地区的西周墓地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表明可能有《周礼》所记载的“墓大夫”掌管墓域,发掘报告论证应为一处具有“邦墓”性质的西周族葬墓地,显然是应予肯定的。

发掘报告已经明确指出,少陵原墓地有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就是随葬武器的墓葬比例偏高。

据统计,该墓地共出土青铜戈124件,分别随葬于78座墓内。多数墓葬随葬戈1件,部分2件、3件或4件,最多者一墓出土青铜戈5件,为别的墓地一些较大的墓葬所不及。另外还出有戟、青铜短剑、盾牌等武器,与其他地区所发掘的小型墓地相比,崇尚武勇的特征非常鲜明,让人颇感不同寻常。

该墓地发掘的429座西周墓,除了出土124件戈之外,还有戟3件,短剑2柄,以及盾牌、弓形器等武器。另外,直径在7、8厘米以上的铜泡实际并不是一般所说的泡,而应是盾牌上所用的饰件——铜锡,也属于兵器。少陵原许多出戈的墓往往有铜锡一件,可以说明是相关的武器,共出31件。出戈的78座墓,再加上只出戟和青铜短剑的墓各1座,单独出锡的墓7座,这样就有87座墓出土了兵器,占全部墓葬数的20%,也就是说带兵器的墓葬有五分之一。兵器作为军备的标志物,往往是和战争、武力联系在一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在少陵原墓地的埋葬者中,约有五分之一的人曾比较直接地从事、参与了与征战有关的事务,或可以说他们曾具有战士的身份。

我们仔细研究报告资料后,感到事实可能还远不止此。依据墓地分期的结果,出土兵器墓葬的比例似乎更要高一些。墓葬登记表显示,除了因无陶器年代不清者外,出兵器的墓葬主要都集中在西周早、中期。尤其是早期偏晚和中期偏早阶段,160多座墓内约有40多座出土铜戈等兵器,而占总数四分之一的量。如果按照女性墓占半数来计算的话,那么就有半数男性墓主的身分都属于战士。

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少陵原墓地的死者中,随葬兵器的墓也有属于女性的。在对出土铜戈的墓葬人骨进行了鉴定以后,可以了解到这样的现象。墓地可用于进行鉴定的骨架中,男性为21座,女性7座,其余的骨架因未保存下来,墓主性别不清。这就是说,此地的部分女性在当时也曾充当过战士,数量约为男性的三分之一。这确是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均未有过的特殊信息,表明该地不仅是半数男子曾入武从征,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女性也有过从戎征战的经历。这样的比例,在全国其他西周墓地确实是极为罕见的。

我们可先以西周都城所在的丰镐地区来比较一下。沔西张家坡墓地于1983~1986年先后发掘西周墓360余座,虽出土了铜戈136件,还有矛、锤、剑等10余件^②,武器的数量略多于少陵原墓地。但张家坡较高级别的墓内常有多件兵器共存,实际分出于40座墓内,出土兵器的墓只占墓葬总数的九分之一。

山西曲沃县曲村晋国墓地是迄今为止发掘墓葬最多的周代墓地,共清理中、小型墓641座,共计出土铜戈86件,出自55座墓内^③,约占总墓数的十二分之一。晋是西周时期的重要诸侯国,所居的河汾之东边邻其他部族,形势比较严峻。《左传·昭公》十五年传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可见晋国当初形势之恶劣,亟需强大的军事力量,但随葬戈的墓数仅有8.5%,即使加上出矛、斧、剑等其他兵器的墓葬共82座,约为12%,也远不及少陵原墓地。

扶风北吕周人墓地的各方面特征均与少陵原墓地类似,共发掘墓葬284座,基本都是竖穴土圻的小型墓,随葬品多为鬲、罐等陶器,也有一部分墓葬内出土了以戈为代表的兵器。发掘报告指出,北吕墓地的“一个特点是随葬兵器的小墓较其他墓地,特别是较周原地区的墓地为多”。据统计,北吕墓地共有32座墓随葬青铜戈等兵器,占实际发掘墓葬数的11%,略高于晋国墓地。报告以出土兵器最多的I区墓地为例,统计有兵器的墓葬占了27%,认为几乎两个男性公民中就有一个当过兵^④,被认为现象较特殊。而这个比例恰与少

陵原墓地的情况相当,或说明两者的性质类似。

以小墓为主体的还有凤翔西村墓地,发掘先周晚期至西周中期的小型墓210多座。出土的27件青铜戈,随葬于24座墓内,有3座墓各出两件^⑤,出戈者占总墓葬数的11.4%。除了15座儿童墓,占200座成年人墓的12%,仅与晋国基地的比例相同。若按分期后的墓葬计算,第一期墓葬30座,出戈的墓5座,为六分之一;第二期墓65座,出戈者9座,占七分之一;第三期墓55座,出戈者8座,约占七分之一;第四期墓32座,出戈者3座,占十分之一。比例最高的第一期平均也只是6座墓中有一座出戈。这还未计31座期别不明的墓葬,将这些平均于各期的话,其比例还会降低,可能为七分之一以上,具有士兵身份者显然比较少。

200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距少陵原墓地西约5公里的长安贾里村东墓地发掘了30多座西周小墓,时代也是以早中期墓居多,陶器组合与少陵原墓地类似,但没有一座墓出土兵器^⑥。同样是丰、镐附近的低等级墓葬,两地随葬兵器的多寡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究竟是这里的人群有尚武的习气,还是另有缘由,就不能不认真考虑。

西周王朝的建立,是历经了持续多年征战的结果。灭商之战,几乎动员了周民族及其友好邦国的所有能量,暂且不说;伐纣之前,不断与戎狄斗争,征讨不顺也可不表;单就周王朝建立之后而言,史家尽管有“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之赞誉,但武王去世后的成王即位之初,就发生了武庚叛乱,周公东征之役历时持久,先后经过了三年。《诗经·东山》感叹道:“我往东山,惄惄不归。”其后又有昭王南征不复之痛,《左传·僖公》答对:“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这样的形势,如何能让周人不枕戈以待旦?配备兵器,参加征战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女性墓葬中发现铜戈,说明西周时期在非正常条件下还存在女性充当战士的可能。

但奇怪的是,为什么包括周都邑所在的周原、丰镐及其他诸侯国墓地的从戎人员比例远没有如此之高,仅有被认为士兵比例偏高的北吕Ⅰ区墓地相仿佛,其中的原因何在,正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少陵原西周墓地距西周都城沔镐约30公里,邻近地区未发现其他的大型墓地,从墓地普遍无腰坑、殉人的墓葬习俗,以及出土的鬲、罐、簋、豆等陶器的基本特征方面来看,这里应该还是比较典型的周人墓地,与扶风北吕、武功黄家河^⑦、长安沔西张家坡等周人墓地有明显的一致性。但由于没有带铭文的青铜礼器出土,具体族属尚不得而知。

在距墓地西北约5公里的徐家寨村,1992年出土过西周青铜器吴虎鼎,铭文记载了周宣王18年赐吴虎封地,有关大臣参与封疆四至之事^⑧。也许,东杨万附近在周代属于吴虎所封采地的范围。鼎的年代属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所记事或略早,但到此时少陵原墓地已衰落几近消亡,两者似难以协调。向西北约10公里现有一杜城村,附近的沈家桥村曾出土过战国秦的杜虎符^⑨,有内涵较丰富的东周至秦汉时期遗址,一般认为这一带就是秦汉的杜县所在。此地也有西周杜伯国故地的传说,村西南有坟丘被指称为杜伯墓,在村南调查确发现有西周遗址^⑩。《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徐文靖笺谓,“殷末豕韦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于杜为杜伯,今京兆杜县。”地望与之相当。少陵原墓地距杜城一带不很远,是否为西周杜伯国所属,似应注意。果是杜建在成王八年,当然属西周早期,倒接近墓地时代上限。但墓地为较典型周文化特征,基本不见外来因素,是否确是杜伯国的领地,并不清楚。假如真是杜国臣民,岂不是有养虎之忧,是什么理由让

一个被伐灭的殷属遗民之国如此高度武装并居于首都附近?

面对这一现象,我们只能相信这一群人可能是专门从事与军事、武装活动有关的人员,这里很可能是一处与军事组织有关的居址和墓地。

依据历史文献和有关的金文材料,可以了解到西周时期曾组建有比较正规的常备武装力量,即由周王朝甚至周天子直接掌控的军队,曾被称为“西六师”和“东八师”(也称“殷八师或成周八师”),是分别驻扎在丰镐和故都周原地区,以及洛邑成周地区的两支军队。西六师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宗周首都安全,维护西土的稳定。东八师的主要任务是驻守东都洛邑,震慑关东广大地区的敌对势力和方国部族。在某个区域发生反叛、动乱等意外变故时,根据实际需要由这两支军队同时或由一支出征,也是其职责所在。这在西周的青铜器铭文及《诗经》等历史文献中均有记录。

眉县李村出土的盠方尊、方彝铭文记周王委任盠作过这两支部队的部门长官,“用嗣六师王行三有司,”“嗣六师罍(暨)八师艺”。禹鼎铭文记载:“王乃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一定是敌方的势力太大,故动用了两京的全部主力军队出征。小臣言速簋载:“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诗经·大雅·常武》有“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的诗句。可能是形势不是特别严重,分别只涉及到一个地区的军备。

西六师和东八师属于西周王朝的常备武装力量,是学术界普遍的认识。那么,这些军队平时应该有相对固定的驻扎地点,在遇到战争或其他紧急状态时,才可以根据需要迅速集结征用。当然西六师和东八师在平时应不会全部集中驻守于一地,这样就容易导致生活供给的困难,甚至会发生一些其他的问题,而应该是以师为单位分区驻防,更有可能是以师以下的基层单位分别驻扎。对于周代军队内部的层次结构,《周礼·夏官司马》有这样的记载:“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为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为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虽不排除这一说法有理想化的成份,但也应有一定的事实依据。

在没有战事或其他紧急情况时,西六师很可能主要是分驻于首都丰镐及故都岐邑周围地区。但从文献记载中是找不得什么根据的,同时未得到明确的考古实证。少陵原墓地的军事特征如此鲜明,我们认为可能与之有较密切的关系,或可以说这是一处与驻军有联系的墓地。在这个包含了大量兵器随葬的墓地中,级别最高的墓仅葬礼器铜鼎1件,与文献记载的周代士一阶层的身份相当,也许是属于卒长一类基层军官的墓葬。

M280是一座随葬1件铜鼎的墓葬,还出土了青铜短剑1柄。短剑所配青铜剑鞘工艺精良、造型美观,可以认为是目前所知全国最漂亮的西周剑鞘。另有一座小墓M452出了人面纹短剑1柄。两墓都不大,墓主身份均较低下。古籍记载告诉我们,周人确有用剑的传统,高级贵族身上佩剑可能还是西周时期的一种风尚。《逸周书》和《史记·周本纪》等文献都记录了牧野之战周人大获全胜,武王进入殷纣都城朝歌后曾手执轻剑(短剑)击商纣及其二嬖女,他的重臣“散宜生、太颠、閎夭皆执剑以卫武王”。但这些人的身份均很高,与少陵原两墓墓主身份相差较大。

检索有关的考古发掘资料,也表明比较重要人物的墓葬中出土有青铜短剑。宝鸡强国墓地情况较特殊,几乎所有男性墓均出短剑,应与该族自身的习俗有关。其他出土短剑量极少的墓地,几乎都只有很重要人物的墓葬发现有剑。如:长安张家坡M152为一代井叔墓,出1短剑^①;琉璃河燕国墓地的重要贵族的中型墓M53、M253等,出1或2柄短剑^②;三门峡

虢国墓地的墓 M2001, 是国君虢季之墓, 出短剑 1 柄^⑬; 曲沃北赵晋侯墓地 M33, 为一代晋侯墓也出 1 短剑^⑭。少陵原墓地的墓葬者身份均不高, 出剑的两墓虽属于该基地的较大者, 但均难与上述墓葬相提并论。这些身份较低的墓葬何以会随葬主要是高级贵族才能使用的武器, 似应考虑与他们生前所从事之职责有关。这样说来更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类墓葬的主人, 可能就是属于士一级身份的卒长。

西周时期的军队, 无论是“西六师”、“殷八师”这样的常备武装, 还是战时动员的临时军队, 实际上多是以氏族或家族为基础来组建的, 族长自然地担任军队的指挥和统领者, 西周青铜器铭文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记述。如班簋铭载“遣令曰: ‘以乃族从父征, 出城卫父身。’三年静(靖)东国, 亡(无)不成。”史密簋铭载“史密左率族人……周伐长必, 获百人”等。商周时期许多专业技能会形成家族传承的特征, 从事专门技能成为一个家族安身立命的根本, 充当国家常备军兵源的氏族也许就是以之为职业, 较少或不承担其他的贡赋或义务。春秋时期鲁国就采取这样的政策对待服役者, 《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 “季氏使其乘之人, 以其役邑入者无征, 不入者倍征。”杨伯峻先生注释说是服军役者, 则免其家之税收, 否则倍征其税, 以奖励从军者, 惩罚不从军者^⑮。当然, 这样的认识与该处为族墓地的性质并不矛盾。也就是说, 少陵原既可能是西六师的卒营墓地, 同时也是与军队有关之氏族的族墓地。

依据上述,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少陵原墓地很大成份就是西六师驻守宗周的某师驻地之一, 更确切地说可能是以家族为核心的卒营墓地。六师卒营分散地驻扎在丰镐周围地区, 显然是为了有效地拱卫京师, 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征调起来方便。同时, 也可能还负有对诸如杜伯国这类迁居京郊而与先代王朝有渊源关系部族的监管责任, 以防他们有异常行动, 危及周王室的统治。

如果有条件对少陵原墓地所在的遗址做一些认真的发掘, 或能观察到与其他西周居址的差别, 必是很有意义的。至于扶风北吕墓地是否也属于驻守岐邑某师的卒营墓地, 尚需要做更深入的论证。

注 释

①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少陵原西周墓地》, 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9 年。

③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邹衡主编), 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④罗西章:《北吕周人墓地》,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⑤雍城考古队:《凤翔南指挥西村周墓的发掘》,《考古与文物》1982 年第 4 期。

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神禾塬考古队发掘资料, 待刊。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队:《1982—1983 年武功黄家河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 年第 7 期。

⑧穆晓军:《陕西长安县出土西周吴虎鼎》,《考古与文物》1998 年第 3 期。

⑨黑光:《西安市郊发现秦国杜虎符》,《文物》1979 年第 9 期。

⑩陕西省考古研究所:《2000 年长安、户县地区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先秦考古)增刊, 2004 年。

⑪⑫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 文物出版社, 1995 年。

⑬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 文物出版社, 1999 年。

⑭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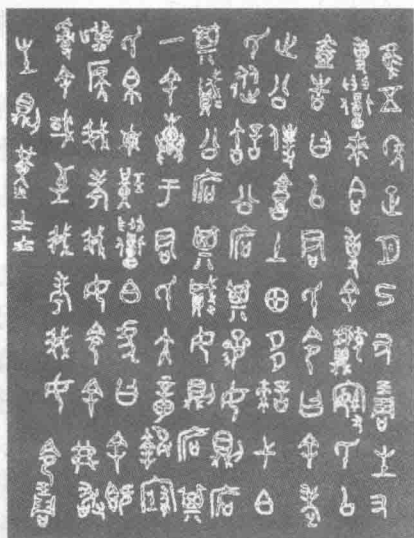
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中华书局, 1981 年, 第 987 页。

(张天恩: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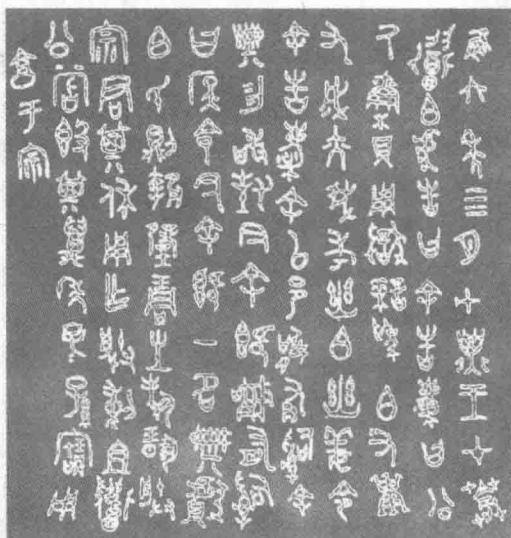
珣生器“附庸土田”再探讨

王进锋

五年珣生簋(图一)、六年珣生簋(图二),旧称召伯虎簋,是文意很难通晓的西周晚期铭文。2006年底陕西扶风出土了五年珣生尊(图三)。其铭文内容(图四)可与五年、六年珣生簋相衔接,而时间正处于两者之间。珣生尊的出土更增加了珣生器理解的纷乱性。



图一 五年珣生簋铭拓本



图二 六年珣生簋铭拓本

在仔细研读诸家文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其争论的重要原因是对其中的“附庸土田”理解有分歧。实际上,“附庸土田”是珣生器中相当重要的词语,它关乎珣生三器的理解。而且,“附庸”问题,也是有关上古社会形态研究的重要问题,对其探讨必将有利于我们了解先秦社会。

本文试图在前辈专家研究的基础上,对“附庸土田”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图三 五年珣生尊(尊甲和尊乙)